

访谈

王飞凌 / 秦中音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中国共产党的 体制性宿命



王飞凌



秦中音

**编按：**习近平已经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经济下滑、民间矛盾加剧，他进一步加强了其一党专政机器对社会的统治力度。在这篇访谈中，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基因（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缺失皇室的秦汉式帝制政体），结构性地决定了其命运。这一体制性宿命使得当权者首要考虑的一直是其权力的绝对安全，“不得不”力求控制一切以维稳；而严控扰民必然制造无尽的新问题与各种反弹，从而迫使当权者进一步加码管控；如此反复内卷，趋向反噬权力本身。

王飞凌教授著有《中华秩序》、《中国纪录》以及将要出版的《中华博弈》（“中国三部曲”）。

秦中音（笔名）为报道中国新闻的香港记者，因安全考虑不便透漏真实姓名。

### 政权稳定的本质：资源汲取和高压管控

**秦中音（以下简称秦）：**多项数据表明，疫情后大陆的经济增长停滞。很

多学者曾指出，经济增长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民众愿意向政府让渡权力的前提是能获得一定的财富回馈。您在《中华秩序》与《中国记录》中曾提到，文革后，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并提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尤其是“八九事件”之后，经济成为一个重要锚点，其目的是挽救中共政权于危亡之中。您认为，当下中国不断下行的经济形势，会撼动中共执政的稳定性吗？

王飞凌（以下简称王）：“八九”确实是一个关键节点，当时中共的统治陷入危机。此后30年中共把经济建设，如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发展基础设施等作为生存和执政的重要基础。客观上说，这对中国、区域甚至全球的和平、稳定及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这对中共来说是把双刃剑。因为发展经济必须对外开放。后果之一便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日益西化（Westernization）、“与世界接轨”。中共的如意算盘是，只在经济领域进行部分接轨，即利用西方国家的技术和市场进行经济发展，但排斥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样安抚了老百姓，也不会动摇中共的一党专政。但这种选择性的接轨是过渡性的，不能稳定长久。就好比两个人谈恋爱，却从不融合，不发展共同的价值观和兴趣追求，而是各怀心思，只要对方给我想要的好处，但不满足对方的需求，这样的关系碍难持续。

现在西方国家提出了“去风险”这个概念，亦即所谓脱钩。我觉得脱钩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因为中国在过去30年与西方从未完全接轨过；都是按中共的选择，极力维持半接轨、半脱钩状态。现在的局面是，要继续发展中国经济，就需要更深入与西方接触，进行必须配套的政治改革。但这势必危及中

共这个威权主义一党专政。所以我认为，在2007年到2012年之间，中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甚至是赌博，那就是中共为保持专政权力，选择牺牲经济发展。这个赌博背后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现在经济发展的很好了，老百姓也相当满意了，我们可以不用再委屈让步去注重发展经济了。

秦：对的，综合各项经济数据的研究和分析，08年北京奥运之后，中国依赖的便一直是经济存量。

王：这是其一。其二是他们在赌一个毛泽东式的强人专断领导，仰赖“红色血统”，视之为增强其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法宝，顶住政治现代化的压力，抵制西化。习近平的上台便是这种赌博的结果。但这种赌博的挑战是，如何在脱离外部世界的情况下运行经济？这其中有一个偏听偏信的问题，就是中共高层认为离开中国大市场是世界的损失，所以才有了过去10多年来一系列的举措。其后果就是经济走势持续下行。

但我认为中共的执政根基并非是经济发展。中共执政的根本一直都是毛所说的“两个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即暴力镇压和宣传鼓惑。中共执政的稳定性和经济的发展并非成正比，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好，合法性就提高，发展的不好，合法性就下降。实际上，经济与执政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和想象。抓牢枪杆子和笔杆子才是赢得赌局的关键。中国社会在日益西化之后，一党专政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否能继续支撑下去？如果能，代价看来便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袋子。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悲观，中共是一个相当优化的专制极权体系，即我称之为“中共最优化” (CCP Optimality)，可以继续统治中国社会，不会因为经济不佳而自动下台。这种体制的代价是长期的、全面的“中国次优化” (China Suboptimality)：中国人民为了一小群统治

者的无比权力和极端奢靡的享受而不断地吃苦、牺牲。

中共不会因为经济危机下台的一大原因，是它强大且没有底线的压榨汲取和控制能力。三年大饥荒是有力的例证。但也不能全然悲观。相较于过去，中国社会现在已经西化了很多，民众要求水涨船高了，中外民间社会联系密切了，所以中共能否赢得这场赌博仍需观察，但中国老百姓在这期间恐怕要受很多苦难。

秦：您提到中共的第二个赌博是，要选出一个毛式的政治强人来接班；但同时中国社会的西化使大众接触到了更多元的价值观，这导致他们的思维相较毛时代的大众开放许多。这是否意味着，被选中的习难以集聚毛当年神一样的精神内催力，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民间不再具备培育政治强人的土壤？

王：这个问题很好。我在《中国记录》里分析了习能否旧剧重演，成为第二个毛。毕竟今天的中国发生了很多改变，这是第一。第二，中共与过去相比也变了很多。第三，习没有毛的“建国”功绩，这使得他无法在权威上与毛比肩。

分析习的执政表现，可以看出他的能力和知识相当有限。他的个人魅力或者说领导力、号召力都不高，只是中共把他给吹起来了，无中生有地大搞个人崇拜。现在对习的造神运动已经非常狂热。虽然他们掌握了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但这种造神效果颇为可怜、可笑，更像一场舞台喜剧。在泡泡未被戳破前，他们尽可以指鹿为马，维持所谓伟大领袖的形象。

秦：您刚才说中共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可以详细说说吗？

王：与1950至1970年代的中共相比，现在的中共已成为精英组织，内部有许多分层，每个精英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中共领导们和九千多万党员的利益并不一致。

这个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对习的崇拜是表面的应付差事。习公开露面时，从陪同官员的神情、姿态甚至穿着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在演戏。作家巴金曾说过，在毛时代大家都是自愿为奴，不仅是身奴，而且是心奴。人为什么会甘愿当奴才？因为这样做他们有好处可拿，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这种所谓个人崇拜和领袖魅力，是非常肤浅的。一旦有真正的风吹草动，就能看出谁在裸泳。

### 高速发展背后的三大赤字：人权赤字、环保赤字和信用赤字

秦：有学者认为好的专制优于民主制度，因为专制的效率、资源聚集能力、分配能力更强，这也构成了中国高速发展的条件之一，您认可这种说法吗？另外，是制度发挥的作用更大，还是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发挥的作用更大？

王：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专制和民主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是互相竞争的体系。其中前者在中国帝制时代达到巅峰，即所谓秦汉政体，也可以称之为是人类政治治理的一个高峰。但这种制度没有继续发展、创新和完善，反而停滞僵化了。而西方社会则开创了开明专制，之后发展到君主立宪和民主政治，形成了人类政治治理的一个个新高峰。

不排除专制制度在某些时刻拥有竞争优势，如动员能力强，可以不计成

本、集中力量做一些领导决定的大项目。但这种优势背后的代价之一，就是秦晖教授提到过的人权赤字。我想再补充两点，即环境保护和道义信用赤字。中国学者陶然就描述了这样一种“逐底”式发展模式。在这三个赤字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发展虽有成就，但是赤字总是要还的，现在便进入了还账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次优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彰显出来。

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这样的现象，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其老百姓却千方百计跑到国外，移民、偷渡和申请政治避难。过去30年，中国一直是到各国申请政治避难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8%，但到美国申请政治避难的多年来一直占到总申请人数的30%以上。这是明显的道义和信心缺失。精英和财富的流失会更加剧“中国次优化”。中国的这段高速发展，本质上是枉顾道义信用、牺牲人权的杀鸡取卵式的不可持续发展。专制政体取得的经济成就，无法抵消其对社会造成的综合损害。

有些有房有车、有工作、有一线城市户口的人，认为在中国生活更便利，从而觉得中国制度更优于西方国家，这些可能是真实的感受，但其实是颇为狭隘、短视。这种短视下，有人也许会觉得专制政体是个吸引人的制度。但即使是开明的专制，也有几个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比如权力继承问题、如何容纳不同的意见、如何保证领导永远开明正确、如何避免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后却大办坏事。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长期来看，即使最好的开明专制也要比糟糕的民主制度差。

秦：中国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所拥有的生活，是其余十多亿老百姓终生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但这些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却以中国人之名扮演着体制捍卫者的角色。

王：统计显示，大概15%至18%的中国人是体制受益者。但他们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捍卫体制。比如，投资移民美国、加拿大、欧洲的人中，中国人占到了80%，这些有钱的成功人士之所以选择移民，大都是因为个体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因为精英组织的分层和利益诉求，不仅限于财富，还包括政治安全感、人格尊严和自由。“中国次优化”令精英们也常常成为高档一点的“韭菜”，诸如肖建华、赖小民、叶简明之类的资本大鳄和权贵大佬的下场，就给党内外中国精英们不断在敲警钟。其他如马云、孙大午、许家印、范冰冰等例子也说明，在中国现有制度下，没有人是安全和自由的，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比如温家宝，他能像欧美国家退休的领导人那样自由看看体育比赛、去海外度假吗？他不敢也不能。最近中国外交与国防两大部长离奇的接连失踪，更是令人发怵。当年，毛刚去世，妻子侄子就都入狱，自己也不能如愿“入土为安”。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精英，在这种体制下得到的仍然是制度性的次优化。

秦：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共高层通过各种方式维护的制度和政权反过来也限制了他们自己？

王：对，他们根本性地缺乏安全感、自由，甚至尊严，实际上都是体制的奴隶。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官员出镜都穿一样的夹克，姿势一律，这种统一的标准动作抹杀了生而为人的自我。当然，他们在下属面前还是像王爷一样耀武扬威：一边当皇帝，一边当奴才。这种人格分裂式的生活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解密的档案显示，包括毛在内的很多中共高层都依赖安眠药，这是很凄凉的。

秦：您提及的“三大赤字”对中国社会和普通老百姓有何影响？



王：中国人与他国民众无异，不是工蜂或工蚁。并不是像官方宣传或希望的，永远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甘于奉献。他们既不是童话里的愚公，也不是假模范雷锋。中国老百姓也是有底线的，低于底线，他们也受不了。于是就有了走线、躺平、更多的社会抗争乃至暴力反抗事件。至于官方和民间无处不在的磨洋工、贪污、欺诈、互疑、大肆造假之类，既是统治体制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人们对这个体制的应对和反抗。

## 中共的宿命

秦：中国经济还能继续发展吗？或者说现行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和经济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吗？

王：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增长，除了依赖前边提到的三大赤字外，中国老百姓的勤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经济享受到了“要素位差”的红利，就是说中国人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期待值在过去被压得很低，和国外存在非常大的位差，就像落差比较大的两个水平面一样。在和西方部分接轨后，带来了一时的巨大落差能量，也就是劳动密集型经济的迅速增长。但很快这两个水面的落差减小，中国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以前不到美国工资的十分之一，现在涨到了三分之一甚至更高。这种优势基本上已经利用完了。再考虑到中国的其他要素如土地、能源和信用的昂贵，中国经济的增长乏力是完全可期的。

其实中共并没有“领导”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统治，一时“允许”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保证一党专政和分配拿大头的前提下，它给了老百姓一定的空间，让他们去赚钱，这就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

的制度原因。不幸的是，不管是要素位差，还是中共的“允许”，看来都是相对的，具有时效性。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日渐消失。

关于中国经济的走向，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中国从此迈进中等收入陷阱，就像许多拉美国家一样。第二种可能是，中国经历痛苦走上创新型经济发展道路，就像西欧和日本一样。但后者需要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来配套，包括产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民众的自由度等等。从当前趋势看，迈入第一种可能性的概率更大，甚至重回毛时期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模式。关键是有没有政治改革。

秦：欧美国家曾寄希望于中国能够通过经济改革推进政治变革，但与之相反，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规则提出了挑战，并意欲让他们遵从自己制定的秩序。在你看来，中国敢于“挑战”的底气和终极目的是什么？

王：习多次提到引领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要给人类带来更文明的社会生活方式。有人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空洞的口号，但北京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做真实的努力。

首先，非民主政权都偏爱喊口号以号令和动员人民。这和毛时期喊建设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解放全人类、天下大同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其次，中共高层想用那一套已经停止进化和更新的秦汉式政治制度去替代西方成熟的民主制度，这是明显的不自量力。但是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历史宿命，也可以称之为不幸的体制性诅咒。

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从前苏联施行起，其使命便是将这种制度模式推

广到全世界。其必定要通过扩张来保证自身的生存，所以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就是要挑战全世界；它本质上就是要无休止的斗争，直到全世界都在其控制之下。中共执政者想永远掌权独裁，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执政者。这与秦汉式专制统治者们的目标一致，都想要“一统天下”，掌控整个世界。这种制度性宿命驱使下，北京在国际上四处任意撒币，徒耗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中共的“最优化”不仅造成长久的“中国次优化”，还在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次优化”。

秦：执掌中国这样的大国还不能满足他们的权力需要吗？制度赋予个体的欲望究竟大到了什么地步？

王：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共产主义制度在没有掌控全球之前永远是不安全的，其追求的终极形态一定是世界政府。我这里所指的共产主义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与中国传统的秦汉式专制主义政体异曲同工的，并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不安全感在前苏联已有充分体现。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已经空前严酷了，还要继续加码，试图控制每个人的每件事情；因为只有对社会进行绝对掌控后，政权才会觉得安全。于是党国陷入了很吊诡的诅咒：要控制一切才会觉得安全，而要控制一切就必然会带来许多问题和抵抗，实际上增加不安全感。对外，这种体制无法忍受外国的民主政体的竞争和影响，因为这些影响会激发中国人民追求政治权利和自由去终结一党专政。

### 政权稳定的四重要素

秦：毛时代强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现在的反复强调“伟大斗

争”和制造外部敌人，导致社会裂痕，大众情绪紧张、焦躁，互信程度降低。这些都是稳定政权的手段和工具吗？

王：是的，外部力量要“亡我”确实是中共的真实恐惧。但这个“我”只是中共领导层的权力私利而已。来自西方的竞争确实可能会亡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但不见得非要亡中共这个党，也不一定要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会亡中国或者中华民族，却会大大增强中国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有益于中国人民。中共党国的政治利益与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之间，显然存在着一条巨大的、持久的鸿沟。只要看一看哪些国家是对中国人民实际上最有帮助、至关重要的，再看看哪些国家是中共官方的所谓友邦，就很清楚。

就像四条腿的凳子才能放稳，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也主要有四个来源，分别是暴力即枪杆子；民众参与即选举、自治和言论自由；政府业绩即经济发展等民粹性质的好处；以及领袖魅力与“资格”，最后一点主要表现为天命神授的君权、领袖能力与功绩、宣传造神与舆论控制。起码的政治稳定性合法性需要有至少三条腿。

但是现在支撑着整个中共党国政权的只有两条半腿，其中的半条指的是不断下行的经济。经济的下行使收买民众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了两条腿，即暴力镇压和政治宣传。没有人可以两条腿站着睡觉而不垮下。这直接导致统治成本极高且效益递减，维稳经费高过国防开支，而这样反过来又使经济发展进一步下滑、收入更加高度不平等，使那半条腿更短而无力，形成挣扎、斗争的死循环。

秦：通过鼓动斗争建立暴力秩序，以及通过煽动民族主义和树立外部敌人，比如美国，是不是也是克服或者转移国内危机的一种手段？

王：是的，但这实际上无法转移危机，反而可能是在玩火。但我认为中共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大众，汲取资源，驱使百姓为所谓“国家安全”出钱出人、任劳任怨。中共统治者将自己等同于国家，这是动员老百姓为其服务的好把戏。

秦：这种对外挑衅会对中国的国际形势产生什么影响？

王：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甚至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把中国视为另类和麻烦制造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清中国现行的制度对全世界人民都不是好事。但中共实际上对外战争还是相当谨慎，主要是喊口号和摆姿态。他们知道很可能打不过敌手。参考毛1949年到1970年代的对美政策，会发现口号喊得非常响，但是一直避免和美国的正面冲突。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命令，必须照做，还要顶个“志愿军”的假名。而毛之后，更是这样，尤其是军事科技快速发展之后，现在战争前后方的区别减少，他们更加小心，只会喊口号来欺骗国内老百姓。当然，扩充武备、煽动仇外、挑衅他国，还是有可能导致情况失控或者偶发事变，玩火自焚。

### 以政权安全为核心

秦：但是这种麻烦制造者的形象无疑会对贸易、科技发展带来进一步的掣肘，甚至封锁，从而导致经济继续滑坡。之后便是社会稳定、经济考验、资源汲取、公众情绪之间的持续博弈。继续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及

中共政权接下来的走势会是什么？

王：可能回到毛时期的革命政权模式，成为更硬化的威权主义、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政权。中共制度里的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或曰秦汉式专制主义的基因，决定了这种走向。这个宿命当然对中国和世界人民来说，都是非常可悲的。

秦：中共高层一边高喊发展经济、引进外资的同时，一边又在对外资企业进行限制和打压，怎么解释这种萝卜加大棒的做法？

王：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是中共的惯用策略；为了统治，可以自相矛盾、食言而肥、不择手段。一党执政与共同繁荣其实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中共的本质是全面掌控，掌控意味着对自由经济的压制。中共从未正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他们的举措和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没有直接关联，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中共政体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经常不符，甚至背道而驰。

秦：经济形势继续下行，地方财政持续被影响，导致公共服务和维稳系统的公务员被降薪、欠薪后，行政系统的稳定性、凝聚力以及顺从程度会受到影响吗？中共对社会整体施行高压管控的能力会不会因此被削弱？

王：会。但只要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都握在手里，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代价是老百姓承受更多苦难。通俗点解释就是多割点韭菜，比如多些苛捐杂税，同时滥发货币，乃至重回配给制度。这样一来，这些经济困难可以在内部被稀释掉，用更多的人民的钱去供养那些重要的人民“公仆”

如军警。我认为地方财政困难并不会对统治构成威胁，这个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它可以加大汲取老百姓的钱（通货膨胀也是一个方式）去弥补一个次优化经济之不足。

中共的真正挑战来自外部，除了战争外就是外汇收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关注粮食安全、退林还耕和新能源车。一旦外汇收入下跌就会无法进口石油、设备、技术和粮食，这些严重的问题不能靠滥发货币解决。

秦：所以这些决策都是以政权安全为主轴。但独裁者永远都不会感到安全，因为面前只有被推翻和自己在任上干到死这两个选项。习曾多次对官员的言行进行明文限制，严禁官员妄议中央、不允许退休干部干涉中央决议等等。习与他的高级官员之间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方式？政权内部的稳定能够维持吗？

王：这很有意思。这是典型的秦汉式帝制或毛时代的回归。在2017、2018年习开始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职时，便明确意味着习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他个人的下属甚至是家奴，而非同事。每个人只有竞相表忠心才能存活，否则就是阶下囚。这种官场机制导致了政治宣传中的习思想要“入脑、入心、入魂”，极为陈腐的帝制语言。但这也陷入了一个权力的怪圈：越独裁越感到不安全，越不安全就越要独裁，最后所有的代价都由老百姓买单。要控制一切才安全，最终只会更不安全。

习的个人命运有待继续观察，政治权力斗争的细节难以预测。但最基本的人类历史与政治科学告诉我们，越想要自己获得安全，便越要给别人安全；如果让别人都不安全，那自己也安全不了。

## 帝制回归与新冷战时代

秦：您写过，1949年中共正式执掌政权后，政权的本质便是帝制专政，但因为内部及外界压力所迫，邓、江、胡执政的三个时期，被迫妥协转向了集体威权主义，短暂的贡献了经济发展窗口，现在则重续中共政权的本质。在你看来，这种帝制回归会是一帆风顺的吗？

王：中共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跃退，把民国时期已经出现的社会政治改革又给扭转回帝制时代。西方来的共和主义和人民主权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不得民心，迅速失败。披着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外衣的中共政权，也不敢公开建立正式的家族王朝。但没有皇室的威权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还不如帝制皇权，因为它缺乏血缘进行内部稳定链接，导致资源被消耗在如何决定继承人以实现权力交接上。邓-江-胡时代的方式是集体领导，其中一个人是核心，这就是杨继绳所说的没有血亲王族的集体帝制。然后有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但现在邓式平衡被打破，重回一人掌权的时代，没有血缘关系加持、没有确定的继承人遴选机制，注定了这个政权难以稳定。

秦：所以即使他已经在事实上加冕了，但权力仍然会是不稳定的。

王：我觉得习的权力比皇帝都大，但根本性地更不稳。皇帝有家族平衡，受到孝道约束，并且搞些“受命于天”的仪式包括“罪己诏”之类。中共将“天命”转换为“民命”，即受命于人民，将这个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出发点。于是便有了习宣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但是人民的定义，在现在的中国，恐怕没人敢深究。人们甚至应该同情习：他这种没有皇室



的独裁者身不由己，自身安全感极差，不能有丝毫的示弱，于是不敢认错、难以自我纠正，必须撑一个全知全能的架子，时刻全面掌控，事必躬亲，却又做不到、做不好。权力对个人的腐蚀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出昏招、铸大错、遭反噬的时候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秦：在中共这种号称人民民主专政的个人极权主义国家，人民的作用是什么呢？人民在制度的运行中扮演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

王：以民为天、为人民服务这种概念都是蒋介石先提出来的，后来毛将其运用得更成功。但是“民命”比“天命”作为专权合法性的来源其实更糟糕。天命下，帝王还会在遭遇自然灾害时自责一番、改弦易辙。但民命下，人民只是一种托辞，其实是肉盾和韭菜。如果真要是“受命于民”，他们怎么不敢让人民投票、发声呢？即使是精英们也不允许妄议中央，更别说老百姓参与国家社会治理了。因此“民命”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完全不受约束的权力。但民意不像天意，是不断变化的。不给人民选举权和发言权，却自称代表民意，其可行性必然低，其代价必然高。

秦：学者重提中西方的竞争仍是制度之争，并表示中美之间已进入了新冷战时代，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王：越来越是这样一个走向。2008年之前，中共因为韬光养晦，引发西方猜测，包括一些学者幻想甚至自欺欺人，说中国已经间接进行了政治变革。但制度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是根本性的问题。而现在中西方制度上的不相容现象越来越明显，其后果也越来越重要。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形成，事实上已经走向了冷战。也可以说，冷战的东亚部分其实并

没有结束。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提及冷战，但相比热战，冷战是不坏的选择。在我的新书里，用“中华博弈”来描述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竞争。当然最好的走向是，中国进行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这样中国依然会是世界强国，还能融入世界秩序，但可能性不大。所以冷战看起来是比较可能发生、也不那么坏的选项。中共用“冷战”这个词作为唬人的宣传套路，但实际上反映了它对冷战的惧怕。

### 继承人难题

秦：对于继承人选择的问题，秦晖有个苏联式国家的测不准定理，即在苏联体制下，当权者不知道他选择的接班人是什么样的人，对方掌权后推行的政策和当权者在世时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左的。因为当权者以外的人戴着面具生活，以迎合在位者。中共的继承人筛选也面临这个问题吗？

王：是的，穿着那些奇怪的夹克衫陪习视察的中共官员们都是在戴着面具表演，所以测不准。此外，中共现在依托的是没有皇室的专制制度，这是人类已知各种政体中最糟糕的一种，因为即使是通过血统选择继承人，也有一定的概率选中一个和上一任差不多的。而现在中共党内的生存法则决定了其遴选机制是逆淘汰机制，即劣币驱逐良币。也就是要对领导绝对顺从，不能比领导更聪明更能干，或者至少要伪装的不比领导能干。长期的伪装和适应会导致真实能力和道德水平下降。这种机制虽然保障了在位者的权力安全，却使上位者道德和能力递减，是一党专制体制的诅咒和悲剧。

秦：在江和胡时期，接班人是较早确定的，最迟也没有超过第二个任期，

但现在习第三个任期连任后却仍迟迟没有公布接班人。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王：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者行为。中共没有像西方那样条例明确的竞选机制，也没有一个稳定的血统继承制度。这两种机制运行下的继任过程大体清晰，使得民众有稳定的心理预期。而中国则完全是暗箱操作，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这赋予了独裁者极大的权力空间，但对国家、民族甚至自己的政党都是不负责任的。我认为习现在是在赌博，要么他继续独占权位，要么全党迎来灾难危机。他可能会像毛一样最后随便指定一个接班人。毛去世后，中共高层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习要当第二个毛，可能是出于对权力的贪恋，以及对自己能力与运气的高估。

秦：如果在最后时刻随便指定一个继承人，会让中国重蹈“四人帮”带来的政治危机吗？

王：预测很难，因为变量太多。但分析毛的最后时刻可以发现，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和悲凉的。他觉得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是混蛋和笨蛋，不听他话的人都活该倒霉，之后的腥风血雨都是那些人应得的。这几乎是所有独裁者的可怜结局。

中共的不确定继承机制会影响老百姓对未来的判断，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比如资本的流动，这些代价最终由普通人承担。权力交接于是可能会引发惊涛骇浪，所谓腥风血雨、暴力再分配已有财富。所以现在很多中国人倾向于短期行为，有条件的人或躲或混或“润”。中国人勤劳、能吃苦，但得到的报酬与付出远远不成正比。像我们这些出生于中国、观察研

究中国的人对中国老百姓可能都会带有些感情色彩，不能不充满同情。

## 未来的走向

秦：根本原因其实还是中国没有言论、游行、示威的自由，官方管控非常严格，这一方面导致了公民组织的缺失，一方面则使得公民运动连雏形都无法形成，更别说去发展和壮大了。

王：中共最害怕的还是中国人民自己。它不允许民众自治和结社组织，但这也整个中国政治推向了脆弱险境。

秦：所以在铺天盖地的宣扬“伟大斗争”的官方舆论场中，普通老百姓也有可能成为被斗争的对象？

王：不同时期的领导人想要斗争的对象不一样，整体来说“伟大斗争”的对象是不服从党绝对管控的人。独裁统治的法宝就是要不断树立敌人。这些敌人可以是地主、富农、黑五类，台独分子、疆独分子、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走资派、贪污腐败分子，还可以是违纪违规、妄议中央的人。斗争对象和敌人完全由统治者根据需求和偏好来确定、随时变换，所以这种“伟大斗争”是永无止境的。而普通老百姓，如果没有成为斗争对象，也还是摆脱不了“肉盾”兼“韭菜”的宿命。斗争的目的就是继续扩大权力、稳固已有权力。但常常是适得其反，越斗争社会就会越不稳定，权力越不安全，这就是中共体制性宿命的诅咒。

秦：按照这种思路，中国似乎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

王：中国的部分领域，如都市基础设施，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但十分偏颇，欠缺很多东西。我曾经和一位中国高层官员沟通，他告诉我，思考问题的时候要先想一下中国最高领导人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如果最高领导人没有动机和理由去解决问题，那他绝不会去做，无论是怎样的好事。而让最高领导人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只有抓紧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所以，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文化西化程度越来越高之后，亟需配套的很多政治现代化不仅缺失、反而倒退的原因。

秦：所以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硬件条件已经成熟，只是高层官员没有动力去做的问题。

王：对。宣扬中国人在经济科技上可以向西方全盘引进甚至赶超，但因为“民族素质”或者“知识水准”不行，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上不能向西方看齐，是一个地道的邪恶欺骗，也是对中国人民人格和智商的巨大侮辱。对掌权者来说，他们的利益绝对是最优先的。这些人号称是无私的人民公仆，其实都是极端的自私自利。消减他们的相对权力、特权特供和个人野心是极为困难的，犹如中国的一句成语，“与虎谋皮”。

秦：但是习反复宣称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在你看来，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该如何定义这个概念？

王：这是个可笑的骗局。现代化哪里有什么中国式一说？中国和美国现代化哪里不一样？官方定义明确说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中共要永远一党独裁专政下去。现代化在各国的一些具体表现当然不会（也不应该）是完全雷同，但绝没有什么按国别不同的现代化。人类的经济技术和

政治社会的现代化是基本一致的、共通的。无论在哪一国，一党乃至一人的永远专政都是前现代的东西，与现代化格格不入

秦：2022年底，中国民间也罕见地爆发了多起游行示威活动，这会是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进行抗衡的新起点吗？对政权会有影响吗？

王：白纸运动是分散自发的绝望之举，力量相对软弱，不具备颠覆的能力，对政权稳定性的影响小。当然越来越多的人觉醒是好事。不过在抗议活动不断被官方镇压后，更多的人采取的是另一种抗议方式——躺平，包括选择不要后代。从经济学角度看，劳动力减少会进一步导致中国竞争力下降以及经济萎缩。

中国的清醒者勇敢站出来，令人钦佩，但往往迅速被消音乃至消灭。长期以来，很多的中国人民被弱化、愚弄、毒化而失能失德，可悲且令人担忧。因为在军国主义“伟大斗争”旗号下，他们会对自己、也会对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

秦：这样一个政权，一方面可以通过超强的汲取能力和管控能力保障自身稳定，但同时却无法避免制度运行的本质带来的自我反噬，它最终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落幕？

王：不外乎和平与非和平两种方式。和平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但现在看来，中共已在尽力堵住和平转型道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减小。剩下的选项是长期次优化吃苦或暴力崩解，这些都会带来剧痛，老百姓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共的统治体制与现代的世界潮流及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都极

不匹配。

比起暴力变革，我更期望通过冷战这种国际竞争促变。考察1947到1991年的冷战档案，可以发现冷战的结局其实对大家相对良好，大国间没有大战和核战，最后和平结束。冷战还给全人类带来了海量而持久的科技红利。

很多苏联集团的成员冷战后都有了政治的现代化变革，扬弃了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体制。有些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比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亚诸国也基本上逃过了非民主政体转变时常有的腥风血雨。中国将来如果能走向这个结局，就是很好的结果了。任何创新、变革都是有代价的，代价的大小以及由谁来承担都是些极有意义、值得为之博弈的问题。我在即将出版的《中华博弈》里，将试图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秦：非常感谢！

